

—

主要毛病：缺乏原创性——巫：西文化强调 *being*，中国文化强调 *becoming* 的根源——这几年的稿费收入：60 万

陈：开讲了？首先我是希望你和我谈完后，这个东西能够整理成为一本比较像样的书。这本书呢，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与你过去的著作相比，有一些不同的特点。对于我来说，就是想把一种真实的东西在书本里保存下来；对读者来说，能够对九十年代出国之后你的所思所想有一点了解。当然我们作为朋友，忘年交嘛，也想把你的性情，把你不会用书面语写出来的东西通过口头语泄露一点出来，或者透露出来。文只是如其人，话则就是其人。我觉得这都是很重要的，无论从阅读还是历史的记录上来说，都是很有意思的。为保存一份真实生动的 *case*，希望你就像病人配合医生一样地配合我吧。（笑）

李：讲完了吗？

陈：这是开场白嘛。

李：开场白讲完了吗？

陈：完了。

李：那我就接着讲了。我是个很性急的人。

陈：跟我一样。我也是。

李：老了更性急。从小到大现在都性急。

陈：一事能狂便少年。性急好啊。

李：那也不见得。性急带来很多麻烦。（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说要把文章里所不能表现的东西都说出来？

陈：或者说是不愿意写出来的东西说出来。

李：我在书里面不愿意说的东西，口头上也不会太愿意说的；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第二个，把九十年代跟八十年代以前划开，我看没有必要。因为划不开。你问我这十年有很大的变化没有？可以说有也可

以说没有。我说过好几次，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起来，变的成分少一点。所以有人说我是过时人物。也有文章说，李泽厚的书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甚至毫无价值。但不管你怎么说，我还是这一套。不过我这次回来最高兴的是，从我收的版税，还有从我这一路听到的、看到的情况看，我的书卖得不错。就是说，我这个“毫无价值”“过时人物”的书九十年代也还有很多人看。这一点我最高兴。好，这一点我就讲这些。

陈：（笑）这里面有几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你刚才说的“过时人物”啊，这个是徐友渔说的？（李点头。）我想他肯定是有他的一些论据的。你能不能就他所依据的理由稍稍地揣测一下？分析一下他为什么这么说？

李：这个我就很难说了，因为这是人家转告我，说他是在一个会议上提到的。这转告也不止一个人，所以我相信不会是造谣。因为他没有写文章，我也就没办法知道他是怎么论证的。人家也没有告诉我他怎么论证，他好像也没有把它当成一个题目。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看法；这是九十年代一些学界人物中的一种看法。我想你所知道的论据可能比我知道的多，所以不必我在这儿说了。

陈：他们的论据我也是揣测的。我估计他们一个是因为首先你在学术上的本门兵器，应该说还是中国的思想史研究。他们这些人对中国的思想史研究持一种非常轻视的态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想有点诛心之论的味道。不管怎样你的影响是超出学界的，在社会上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客观上，在媒体上就成为公众人物这样一种角色；而他们也同样如此，虽然都是学界上的人物，在九十年代的媒体也是比较受关注的人物。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有一种心理上的嫉妒？也许不是很准确，可能是一种打擂台的心理在作祟。

李：我倒希望这一段你能保留下来，整理一下，正式发表。（笑）

陈：这肯定没问题的。你放心好了。

李：我倒不是从这个角度分析。很多人都说这些人是因为嫉妒你、猜忌你，所以采取对你挑战的方式。还有一些人的方式是不理睬你，当你根本不存在，……各种形式吧。这个我想我管不了。我倒觉得，九十年代的媒体炒作比较厉害；八十年代“炒作”这个词似乎还没出现。相反，我在八十年代便遭到各种各样的批评，包括老一辈的、同辈的，也包括年轻的。当时我就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老找我的茬？当时我纳

闷。大概是我这个人没权没势，有些学者，要么是当官的，要么是半官，要么是老头，是这个“老”，那个“老”。我既非官又不老，最好欺负，所以就找上我了。现在有人说在八十年代好像我在称王称霸，其实根本没有。至少我自己是毫无这样的感觉。我既没权也没势，记得当时有人写信给我，还以为我是哲学所的什么重要人物，希望我在《哲学研究》上给他发篇文章，好像只要我说一句话就可做到；他不知道我自己的文章在《哲学研究》可能都发表不了。（笑）

陈：这不是你的悲哀，这是《哲学研究》的悲哀。（笑）

李：我十年之内（1979~1989）在《哲学研究》只发表了两篇文章，不敢给他们，怕退回来，他们也不向我约稿。

陈：你对我说过你的文章都是一些很边缘的刊物发表的。除了《中国社会科学》上一个“孔子再评价”还有一篇“宋明理学片论”。

李：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当时由丁伟志、最初是黎澍他们主事，他们对我比较有兴趣。

陈：继续说。

李：七十年代“四人帮”刚刚垮台，《中国社会科学》还没有创刊，那时胡乔木他们还没来社科院，黎澍《历史研究》1977年初就发表了《论反复》。黎澍的副手当时是丁伟志，这篇文章至今海内外还有人征引或提及。但我一直没权没势。我的研究生留在哲学所的只两个；蔡仪的全部留下了。

陈：刚才你说是……

李：九十年代你讲是轻视思想史，我不同意这看法。因为搞思想史的大有人在，书也出得不少；包括这次得《读书》奖的，不大部分都是思想史的著作吗？但一般都走向专业化。我的书呢，一般都不是那么专业化。于是他们就觉得这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了。我想这可能是个客观上的原因。我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两点：第一，以前我跟你讲过，我那时候提出的东西，好像我那些书，现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在当时很不容易。现在是常识的东西，在当时并不是常识。现在大家都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但哥白尼那个时候要说地球绕着太阳转，那简直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不能忘记真正的科学进步、学术进步得到的东西，现在变为常识的，在当时是一步一步很不容易地走过来的。第二，我觉得我有些东西至今也还不是常识。（笑）只是没有充分发挥，没人注

意。我这人比较懒。很多文章本可以写得很长，包括《中国古代思想史》、《美的历程》等等都可以写成很厚的书。我只写了个小册子，包括最近写的《己卯五说》，我在去年的一个答问（指《芙蓉》杂志发表的那一篇——编者注）里面讲，我本来想写成五本书，最后变成了五篇文章，实际上是提纲。我的书基本上都是提纲性质的。如果写成一本厚书，那当然说服力就更大，旁征博引，层层论证，在目前来说学术价值就高了。但我不这么看。我是搞哲学出身的，我觉得提供一些基本的想法、观念、角度，如果对人家有启发，就可以了。至于其他什么标准、规范，我向来不大管它。《美的历程》很多人就说不规范，哪有把什么（到现在为止也确实没有）文学和各种艺术放在一起一锅炒的。外国好像也没有，我就不管它了。但是这个书就是受欢迎。包括在台湾也如此。好些人说看了之后感觉有启发。我说这就够了。我的书不一定要使人心服，或者要人家来引用。我没有这个企图。只要读后觉得还有意思，有点启发，就足够了。因为哲学也只能够起这个作用。所以这是跟史学包括思想史的学者著作不同的地方。我是非常尊重史学的，我跟很多人，包括一些朋友的子女要考文科的说，我主张考历史系，我以为文科以历史学为基础。我是很注重历史的。但是我自己的方法却不是史学家的方法。概括刚才讲的，一是，现在看来是常识性的东西，当时并不是。现在肯定王国维和梁启超算什么呢，算是常识；在当时就不是常识，当时的常识是彻底否定。好像《美的历程》对汉赋是肯定的，现在是常识；但我记得《美的历程》出版的同时，一个很有名的文学评论杂志上一篇文章说汉赋是我国文学的耻辱，这在当时是常识。第二，我的书里有许多东西到现在为止还不是常识，这也是还有人愿意买愿意看的原因。假如都是常识性的东西，那你还买来看干什么？现在就不会再去买认为地球绕太阳转的书了。是不是？我不太爱说狂言，不过现在想说一句：我那些书里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人认真注意。也许过几十年以后才能被人真正认识，我常常只点到一下，就带过去了。但是我无所谓，我已经做了就行了。（笑）

陈：这个问题肯定还会讲到。我现在还是抓住刚才讲的那个。你和权力没有关系、距离比较远，肯定一方面有一个古人所说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人必毁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的问题。而实际上

呢，还有一点，你自己能不能承认，或者愿不愿意说，就是在你的个性，是不是在这个社会里面，本来只是你的个性的完全是一种自我表达的东西，在别人看来却似乎是一种侵犯性的东西。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能不能就你的个性稍微做一点表述？

李：个性……

陈：个性特征嘛。

李：这个，让别人来描写我的个性，我加以评论还可以；让我自己描写我的个性，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不喜欢谈自己。这就是我的个性了。你让我说个性，个性就是不喜欢谈自己。

陈：你不喜欢谈自己？反正呢，嗨，你自己的个性不会因为任何人而改变。

李：那倒是，我不大受环境影响。不管你对我说好话也好、坏话也好。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夸过我，好话听得太多了，包括我初中的作文，当时就有人说是大学生的水平，……这样的话听得太多了。所以后来好话对我没有什么影响。我不会飘飘然。我从来不以为自己的东西有什么了不得。你骂我呢，我也不在乎。骂我倒是小时候很少听到。但是这几十年倒听得不少。当年我才二十几岁，蔡仪就在《人民日报》把我批评得好厉害。以后更不在乎了。因为自己知道自己文章的价值在哪里就行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但我也不是完全不理睬，我注意人家骂我、批评我中有没有说对了的东西，只要说对的，我都吸收。这一点至今如此。这是我的个性。这当然包括不同意见，好朋友也可以有不同意见，那么争吧；我是爱争的，包括朋友之间，从不让步，当然了，争论完了还是朋友。我和你就是这样吗？这倒符合孔老夫子讲的，君子和而不同。我是和而不同，是君子交友之道。

陈：那咱们还是要在徐友渔身上再作一点小文章。我注意到你在《南方文坛》上跟别人的一个笔谈中提到过前一阵前几年“陈寅恪热”“顾准热”中间，对顾准他们学问的吹捧，实际上我注意到从学理上把顾准评得、抬得特别高的，包括引入苏格兰学派或者什么的，这就是徐友渔的文章。根据我的阅读范围来说，我认为他是从哲学的角度给了他很高的评价……

李：对谁的评价？

陈：对顾准。对陈寅恪，说真的，我在《中华读书报》写过一篇很小的文章，叫《谁解陈寅恪》，后来有些地方也转载了这个东西。我的意思是很多

人的马屁都没拍到马屁股上去，或者就是像你刚才说的一样，对陈寅恪的专门之学，实际上很多人是不知道的。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呢，大家跟风，一个时髦的话题，你不说上几句就显得落伍了，在学界也显得很没面子。实际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个东西没有。徐友渔对顾准的这种评价，从学理上给他非常高的评价，似乎是一种权威专家打分。只有你说出了真相。

李：这个我不知道。

陈：你那个时候肯定不是针对他来的。

李：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陈：我知道你不是针对他来的，但是我给你补充一下。

李：那好。

陈：一不留神……（笑）

李：因为我没看到，我在国外，很多东西看不到。

陈：这个我是有一点了解的。

李：顾准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是非常了不起的。但因此认为他的那些学术理论也是不得了的，那就不对了。因为，他不可能，在那种……

陈：在那样的知识和信息的资源背景下……

李：那样的环境之下，怎么可能呢？

陈：对。他那个《希腊城邦制度》，说实话我是最早给予关注的。八〇年我在刚上大学没多久的时候，向许多人做过推荐。但是，几乎没有几个人指出过，他用的所有的材料都是二手的，来自于中文本缩写本的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当时有没有中文本？当然，顾准能读英文。

陈：当然有了。内部的一个本子。

李：没有刊印？

陈：这个我知道。它当时也不是从英文过来的，这个你可以去查查的……这个《希腊城邦制度》我向很多人推荐过。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我就非常看重它的言外之意，西方知识和思想对中国现实状况的刺激作用。有点像梅因的《古代法》，讲契约对身份的替代。

李：九十年代有“风”症，不好。一吹起来就东倒西歪，就是你们这一代学人，有的比你年纪大一点。

陈：你说到我们这一代学人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你从外面回来我们在聊

天的时候，你发表了比较系统的看法。

李：哎，我的讲话到底能不能听清楚？

陈：你放心了，不会浪费你什么的。这机器是新的，不敢浪费你的感情，更不敢浪费你的思想。

李：我怕浪费时间……

陈：时间嘛，聊天本身也是很有趣的，你不觉得吗？

李：嗯……

陈：当然。我觉得我们的趣味应更大一点点，理趣多一点点。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一个词，叫“新派教授”，颇为不屑地，这个词，带有一点贬义的吧。

李：我没说过这个词。

陈：你说过“新派教授”的，跟我说过。

李：没有没有。

陈：你不要不承认了。

李：没有没有。

陈：你口语中间说过，“现在的新派教授”。

李：我只讲现在年轻的……

陈：你讲过的“新派教授”这个词……

李：我没有。

陈：你那个口语中间有，我那个文本中间肯定也有。不着急。

李：没有。

陈：你不承认可以。我只是说……

李：你曾经跟我打过赌，你要记得都输了。你要吸取教训。你怎么不吸取教训？

陈：我已经说了两次了。

李：说过几次了？

陈：说过两次了。

李：恐怕不止两次了。

陈：事不过三。

李：呵呵，你可不止两次了。哦，我们不讲这个了。浪费磁带。（笑）

陈：没问题，磁带很便宜的。这些，说出来很有意思的。

李：我没有用那个字，我觉得不尊重人。

陈：你……

李：我不会用这个词，不管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没有；你要是查起来，我可以跟你打赌。但是我说过年轻教授和不年轻的，以后我可以加个“后”；“后年轻”因为他们也不年轻了（笑）但比我年轻，也因为“后”字很时髦。

陈：咱们也不纠缠于这个词了。反正你说它这个……

李：这个词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我反对这里的二分法，把人划分为新派、旧派……

陈：没有。你这个“新派教授”是这样理解的我记得当时是……

李：那是你的词了，这应记录在案……，是陈明使用的，李泽厚并未使用。

陈：没问题了。我这个是要原汁原味地、原汤原汁端到读者面前的。

李：好的。

陈：这个没问题。只是我想说，你这个说“新派”的时候，我这个新、旧啊，不是指思想新旧，而是说，就是恢复高考以后，上大学，然后读研究生，然后作讲师、副教授、教授啊这条路上来的。区别于你们那个时候的，教育可以说不是很完整的，那样一批教授。我想你指的是这个。而你对这一批教授曾经是寄望甚殷啊，但是后来你好像是又发出了白云苍狗之叹啊这样的感慨。现在可以说这样一个群体从九十年代以来已成学术界的一个中坚力量了。这样一个群体，你肯定是有看法的。因为你用过这样的词，或者说你没用过“新派教授”也用过“年轻与不年轻的教授”这样那样的词，能不能对这个群体说几句？

李：当然可以说几句。我的评价不低。我讲过现在应该是专家的时代，我十多年前说过会有各种各样的专家，我们会有胡塞尔专家、海德格尔专家、朱熹专家等等，当时没有，现在都有了。我一直提倡这种专家，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专家，现在还是不够。不满意的现象就是有些人当上专家，有些人还没有……应该说还是半专家吧，还在路途上，就目空一切，骂倒一切。古人叫轻狂。所以我更赞赏的是那些踏踏实实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做出了贡献而并不张牙舞爪轻视别人的人。我所不满意的“年轻与不年轻的教授”，形式、内容都有，形式就是“语言欧化”。

陈 语言欧化……

李：不只是语言，他们思维也想学西方的。所以我说写中文像英文，写英

文像中文。包括大反传统的“五四”也并不是这样，胡适讲究明白如话，包括鲁迅的文章，也不是像现在写文章似的，弯弯曲曲，似通不通。包括林语堂。林语堂的英文很好，但他写中文就是中文；他不是像我们好些人写的中文就像英文。特别是，本来可以这么说的，偏要非常别扭地那样说，连语法也不对头。内容上不满意，是我感觉原创性差。光是搬来一些东西，套在中国的东西上。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原创性，有些地方，有些作品，不能抹杀一切。倒是那些风头很盛的人物不大行，都不过是搬西方，你搬这方面的，我搬那方面的……还有一些就是炒古董的，炒古董的也没炒出什么东西来。

陈：“炒古董”是什么意思？就是炒国粹吧？

李：九十年代商业侵蚀对学术的干扰很厉害，在摧毁学术健全发展上，作用更坏。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就穷，“君子固穷”的确很难。所以也可以理解，可以原谅。

陈：学术明星，现在有不少这样的人啊。

李：你也坚持不住。没办法，大家想要改善生活嘛。去年我在那个答问上讲了这个问题。

陈：这个你还可以说一下的。就是说，中产阶级化的问题，实际上有一部分人是中产阶级化了的。而知识分子群体呢，也有这样的一种渴望、冲动。你怎么看待这个？

李：这当然是，在整个社会当然是好事情。首先是影视界，在广泛的文化领域里面，最早中产阶级化的可能在影视圈里面，还有就是一些大画家之类的，那时只是少数、极少数。当然还要靠整个体制的变化，教授假设每年工资 20 万，那就会不同一些，对吧？现在讲三五万还远远不够。将来慢慢会更好的。

陈：比较乐观呵。

李：这个乐观我前几年讲过，教授工资肯定要涨，我还是讲对了。因为不这样做不行，不这样很多人就一去不复回了。

陈：跑了呵。

李：一去不复回了。到国外，到国内外资企业什么的，所以不改不行。所以……我讲是怎么掌握一个度的问题。既保证生存，另一方面又能多做一点学问。西方已经有几百年象牙之塔。中国根本没有。要重新建，怎么建？很难。这是保证学术质量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它需要

一套体制、一个传统。我们的古代，是有的，1949 以前还有，1949 以前大学教员的薪水是蛮高的。包括五十年代初的时候，一级教授例如金岳霖一个月工资 345 元，那很高了；那时候毕业的的大学生一个月才四五十块钱，更不用说其他人了。距离拉得那么大，保留了 1949 年以前的传统。后来呢越来越平均化。现在平均化的思想还很严重。好，还有什么要讲的？就这个问题……

陈：还是先按照你话题里面的一块引出来吧，不按什么专题按部就班了，这样谈话的特征就能够体现出来。

李：怎么样？现在。

陈：没问题了，你不用担心那个了。

李：我是说我谈得怎么样？

陈：讲得可以，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喷泉里流出的都是水。

李：你来什么我就对应什么。

陈：当然了，我是什么啊，顶多是一个小卒，你，是天下第一剑啊。

李：我不敢这么吹牛皮。

陈：是这样子，今天以天下第一剑自命的人不少啊。

李：我从来没这么自命。

陈：但我现在认为你还是，你还是可以这么说的。华山论剑的第一高手，这十年没人能动摇。虽然很多人说，李泽厚过去了，前几年我参加了很多聚会，他们是些什么人我也很清楚。尤其，那也不是学科内的人，你知道吧，要不就是对这个学科很轻视，要不就是在这个学科里面玩票，而且是不知深浅，这个我知道。我可以举出几个名字来的：一个玩票的人我说是黎鸣；还有一个对这个学科比较轻视的人，像雷颐……

李：他是这个学科里面的，近代史。

陈：近代思想史和古代思想史我认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当然了，这些人也都是朋友啦，这些人你都认识了吧。

李：雷颐我认识的，比认识你早。

陈：可能是，我们湖南的老乡。雷颐是很有文才的一个人啊。

李再说。

陈：我已经一样举了一个就行了嘛，你还让我把朋友得罪光啊？朋友们，陈明这厢先道声得罪了！

李：这个可以不记录在案。

陈：记录在案倒没关系。

李：你记录在案也可以。告诉我一下，让我晓得。

陈：他们不是特别明确地表达的这种东西很多了。还有什么，哦，贺卫方他们这么一些。

李：什么？

陈：贺卫方，北大法律系的。你都不熟了，他们从总体上来说，都是自由主义的色彩偏多了一些了，这倒是真的，轻视本土文化资源。真正我们学科领域里面的人嘛……

李：“新左派”不一样吗？

陈：新左派，我觉得，对新左派这个词的提出，我认为就像想起毛毛虫一样，这个词，非常叫人起鸡皮疙瘩的。怎么可能呢？像我这种人，对新左派的这种思想倾向，嗨，太不可能了。

李：那你对新左派看得太少。

陈：我怎么不看？但是……哎呀，我在网上也看了，人也交往了的。

李：哦，网上？文章看出……

陈：人也交往啊。

李：他们学问可比自由派强多了。

陈：你认为汪晖是新左派，我没多少这方面的印象，不可能吧？

李：不是我认为。但新左派这个词呢，在《己卯五说》里，我不用新左派的。

陈：就是，用的民粹派。

李：他们代表一种思路吧。像雷颐啊、徐友渔啊，和这些人……不一样的，像国外的崔之元，包括甘阳、张旭东，他们读的书比自由派多。

陈：邓正来他们？

李：在自由派中，邓正来认真翻译介绍哈耶克、很不错。

陈：比邓正来之外的那些自由派学者？

李：对。邓比好些所谓自由派的风头人物要读书多一些。我讲的“书”主要是指西方的。

陈：是啊，这些事情……在刚才的这个讲话里边讲到变与不变的东西，我听你讲过很多次。这个我不大理解。虽然都认为你变化很大，你总是说你是不变的。

李：你说我哪儿变化了？你讲得出来吗？

陈：比如说，你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啊，就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虽然你

承认或者肯定救亡的必要性或者说合理性，但是你本身倾向于启蒙，认为它应该成为主旋律或者说是主导的方面，应该继续下去的这种。

李：这不准确。

陈：不准确？那就可能吧。不过你的变化啊，大家都能感觉到的，也许找不到文本上的证据。因为你每次都能找到一个很好的文本上的证据来说明你“我就是 50 年前、或者五十年代的时候就这样说了”，或者说“七十年代就这么说了”，也许。因为你的文章当然你很熟悉，那么是不是反过来可以这么说，你这十年就没有发展，可不可以这样说？

李：那当然不对。当然有发展变化嘛，怎么会没有变化呢？但是我变化还是沿着我原来的思路的发展而变化，无论是美学、思想史、哲学都是这样。像美学五十年代我提出美感两重性，七八十年代讲创作的非自觉性等等，便如此。思想史五十年代对革命有一种盲目的崇敬态度。后来当然有变化。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对戊戌维新评价那么高，在大陆学界就比较少。我对康有为评价很高，当时也被批评。哲学上我至今还是讲实践，还是讲唯物论，也没有大变化。只是讲得更加具体，有所提高。好像刚才讲革命的问题。在八十年代就没有这么明确。还有一些东西就没有讲得这么直接。我举过好几个例子，所以不是讲没有变化没有发展。

陈 那……

李：是基本脉络没有变化。这个意义上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如对马克思的态度，许多人对我很不满意，搞半天你还讲马克思，哦，我就是还讲我的马克思，我还讲我的实践哲学，我讲你们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你们这一代，或者比你们更年轻，并不了解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新左派里的一些人还比较认同马克思，对我这一点呢，比较理解。不讲马克思，纯粹是赶时髦，一提马克思就认为过时，其实不见得。

陈：变不变，就扯到马克思。你对马克思是读了的，你说不仅是读了马克思，而且是读了相关的古典哲学的呵。

李：我读了好些马克思主义的书。

陈：这是你的思考背景嘛。

李：第二国际的，列宁、斯大林的，列宁、斯大林的读了不少。还有卢卡奇、葛兰西的，等等。你现在看看马克思主义的书，有好些还是不错的；当然有很多错误，那是没问题的，包括马克思本人。

陈：那你怎么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國自己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的关系，或者说在这种关系中评价评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李：这是个很大的题目。根本不是一本书可以讲好的。

陈：你想讲多少就讲多少。

李：我只能讲几句。第一，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就已经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了，这跟马克思主义、跟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就有很大的距离。第二，对十月革命怎么评价呢？这个问题就大了。第三，就是它的确领导了中国共产党搞了一场农民革命，而且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陈：呵呵呵，点到为止了。说这三点就够了。你刚才讲到的一个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说的是，如果说两军对垒，胜利的那一边你就说是必然的，说他是正义的，有可能是这样的吗？

李：那不一定。

陈：对，实际上是不一定的……

李：对。

陈：这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是，不以成败论英雄，是这样子的。

李：这中间有很多偶然性。还有一个我的变化，我八十、九十年代跟五十年代不同，就是强调偶然。我一再强调，只有重视偶然性，才能说明历史是人创造的，每个人都有责任，都在主动创造历史，当然领导人的责任更大一些。因为人家要吃饭，所以经济、某些经济规律，以及科技的发展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与之相关的政治制度的变革，例如从中世纪的人身依附到现在的人身自由，这个变化全世界都有。这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很多东西是例如各种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思想学说、或者某种历史事件，特别是政治事件，都有很大的偶然性，没有那么多必然。我以前讲慈禧太后要是早死十年就好了，早死十年，戊戌变法就可以成功了嘛。我现在讲晚死十年也好了，晚十年呢，也许就不会有袁世凯掌权和以后的军阀割据，如此等等。

陈：每个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人能弘道嘛。

李：换个题目接着讲。中国传统很强调人的主动性。《己卯五说》中的第二篇文章《巫史传统》就讲了这个主动性的特色，非常重要，到目前为止，好像注意的人还不多，虽然在海外也有好几位学者打电话来，重视这篇文章。但我一开始就讲这是哲学的写法，不是历史的写法；尽管

我根据的材料是历史的，但是从哲学视角去看的。我不是搞历史的，张光直、李零、李学勤可能更有能力写这样的文章，可他们没有写。我只好尽量利用他们的学术成果，作我自己的发挥。我注意到苏秉琦、张忠培在新石器时代考古里就发现神权与王权是合一的。巫就代表着神权的力量，这篇文章主要讲两点，一是巫君合一，一是巫的理性化，后者极为重要，又与前者不可分。很多民族文化里面都有巫，中国的特点就是理性化，巫发展为礼仪道术。李零最近的讲礼仪、占卜和方术都是从巫术中发展出来的。我看了高兴极了，正好可为我用。尽管他讲巫的地位很低，远在王下。这个没有关系，因为我不是讲“巫”这个词语的问题。在《孔子再评价》文中我已把“巫术礼仪”联在一起。关键在于由巫术，*magic ritual* 变为 *rites*，这就是理性化。这个理性化的最后完成，我认为是周公，我对周公评价极高。中国这个巫的特征，也就是这个理性化的特征很重要。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那样的宗教？为什么在中国，人的地位一直那么高？在那些教里面人的地位都不高。刘小枫说，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是地位太高了，人应该跪在上帝面前请罪。中国相反，人可以参天地，赞化育，可以参与上帝的工作，人是天地人三才之一。人的作用非常巨大。人道与天道合一，神人合一。这个根源从哪里来，我认为我找到了，这就是来源于巫。巫的特点，巫跟宗教的不同，韦伯、马林诺夫斯基、弗雷泽都说过，是强调人去支配自然，强调人的主动作用。我这篇文章就是强调分析巫的几个特征：除主动性之外，如动态性、重过程等等。巫术本就是跳舞，在跳舞中神明出现。神明在这里不是对象化的存在，不是 *object*，它是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是在人活动的过程里面出来的。

陈 呈现 *,becoming* 而不是存在 *,being*。

李：就是在过程里面出现，跟过程分不开。不是一个静止的对象坐在那里供人祈祷。我就巫的特征说了几点：人的主动性、过程性、情感性。巫术活动当然充满狂热情感，并非冷静思考，等等。情感性恰恰也就是中国哲学的特征。好些人讲不清楚，为什么中国的情、理是结合的？从哪里来的呢？所有这些都我觉得别人没有讲过，我把这一点讲出来了。当然也只是一个假说，这篇文章作为一个历史著作是不行的，因为它材料太少、论据也不够，但是我觉得从哲学视角来讲就可以了，相信不

会大错。像李零讲三代的王跟巫是两回事，那很可能，但不影响我的论点。因为我并不扣住“巫”这个词作文章，我讲的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神权和王权的合一。为什么理性化，它和政治有关系，因为王能掌握神权，神权自然要服务于世俗的王事，以致形成政治、伦理、宗教三合一。巫后来演化为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却并不妨碍神权王权合一的悠久传统。李零的文章也讲，中国最早是崇拜天、地、祖，祖先也就是人。天地国（君）亲师的崇拜一直到 1949 年。我认为这样，我就把中国文化基本精神在这……

陈：发生学的源头……

李：但这是从哲学角度去看的。

陈：你认为自己把握了？

李：哦，我认为这是对中国思想史一个很重要的看法。

陈：贡献？

李：不敢讲贡献，但这是看法。我认为这样，别人不认为这样，那当然可以。我认为解决了问题，自己觉得很高兴而已。讲一点，我把这本书（《己卯五说》）寄给余英时，他回寄给我一篇英文文章，还没有发表，很长很长，有几百页吧。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也是巫，根源是巫。他在电话里和我说，我们是不约而同。我当然非常高兴。都认为中国思想是从巫术出来的。当然他是历史学家，有很多的材料。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他是遵照着雅斯贝斯的 *break through* 就是突破的说法。所以我讲，你是一步走，我是两步走。他认为自上古到孔子，来了一个大突破。我分两步，周公是第一步，孔子是第二步，没有完全遵循雅斯贝斯的说法。我以为周公把巫术这一套传统完成外在的理性化，变成一套系统，一个政治和伦理的制度；孔子和儒学再把这一套归结为心理，孔子讲仁，中庸讲诚。重要的是相同的地方，就是我和余英时都认为这个巫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巫史”这个说法很早就有了的。但是没有人很好地讲这个问题。所以我讲，看看下一步能不能引出一些东西来。当然我写得很简单，包括老子的东西，恍兮惚兮啊，这些都从巫术那里来的……

陈：是从巫术里面来的。

李：啊，就是，实际上就是遗迹。描写那个道，那个不可捉摸啊什么东西，它不是描写一个人格神，一个上帝，恰恰就是把那巫术那些……

陈：巫术里面的神明。

李：中国人思想观念里的神明出现在过程里面，“视而不见”，什么什么，老子那些非常费解的话，我认为都与巫术活动的过程特征有关系。

陈：就是巫术活动过程中一种体验的……或者说是这种经验的描述。

李：这个神明是来自体验……

陈：对神明的感受啊。

李：那个跳……巫术那个跳……跳……

陈：巫和舞肯定是有关系的。

李：跳……跳，好像神就附体……因为神就来了嘛。这也就是“道”。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并不在阴阳活动之外，阴阳我解释为巫术活动中的动静两态。

陈 对。

李：神就在过程里面出现了嘛。他是在动的舞中出现的。他不是一个上帝坐在那里，让人在那里叩头。不是那个东西。

陈 不是。

李：所以中国为什么不讲 *being*、存在，而讲 *becoming*，讲生生不息，讲整体，讲过程。所有这一切都来自这个东西。我认为这是了解中国文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不讲所有，但至少很主要的一些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特征都来自巫术。……好像还有一点，我记得有两点到三点与余英时不同。

陈：大同小异啊。

李：是他的原话，“我们不约而同”。我笑了，我回答他说，“英雄所见略同”。呵呵。因为没有别人讲过。

陈：余英时，你能不能讲讲这人？好像我在哪儿见过，是谁转述你的一句什么话。说是你曾对庞朴说，如果没有文革啊，余英时他们这种地位啊，就应该是你们的。是这个意思？好像我是在什么地方看到过。

李：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并不见得我的地位就一定比他们低……

陈：（笑）是，是这样的。余英时他们在台湾都是叫大师啊。

李：台湾也有人叫我大师的！

陈：是啊，他们比较容易说出口。

李：在台湾，叫我大师可不止一次。有一次还是在一个正式的、相当规模的，就是级别相当高的学术会议上，也有人称我大师；见诸文字的也

有。不过这都无所谓。大师不大师不重要。

陈：这是无所谓。

李：这个不重要。问题是真正是你的东西、你的见解。这个见解的确有一定的意义，那就行了。

陈：那是不是可以说，提出这个巫史文化这样一个命题，或者这么一个概念，是你九十年代，你认为在中国哲学史，或者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成果？

李：那当然是这样的。怎么样估计我都不觉得过分。

陈：嗯。假设和八十年代哪个文章比一比，《孔子再评价》，或者是《宋明理学片论》，可以约略当之？

李：比那些文章要好。

陈：还重要？

李：那当然。

陈：好，是文章好？还是……

李：比那些重要。

陈：重要呵。

李：不过当时那些文章能起作用，现在文章不能有当时那种效应。

陈（笑）是。

李：那为什么呢？都是研究……

陈：应当说是整个知识界的状况已经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可能是大家都是处在一种思考状态，就是找不到一种什么东西来表达表述自己，思考，突不破。而你呢，可以说，就是捅破这一点。或者说提供了一种选择，观点也很清楚了，论证也很充分。而现在呢，对这样的问题，好像大家都想明白了，这些东西呢，或者认为不重要，或者认为谁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就好像一点点知识，给了他无穷的自信。所以，对真知灼见的东西，他可能反倒没有感觉了。不像那个时候还有点真诚，或者说是大家还都不太明白的时候，有一种真诚的渴望，可不可能是这样子？

李：这我就没有研究过。

陈：你刚才说你……

李：一个可能性是现在知识信息量大，书太多，清浊好坏并陈，善于选择、善于判断并不容易。